



金融博士论丛·第十二辑

Zhongguo Hongguan Jingji
Bodong Beihou De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 政府因素分析

Zhengfu Yinsu Fenxi

董进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金融博士论丛·第十二辑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背后的政府因素分析

ZHONGGUO HONGGUAN JINGJI BODONG
BEIHOU DE ZHENGFU YINSU FENXI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智慧

责任校对：李俊英

责任印制：丁淮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政府因素分析（Zhongguo Hongguan Jingji Bodong Beihou de Zhengfu Yinsu Fenxi）/董进著．—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4

（金融博士论丛）

ISBN 978 - 7 - 5049 - 4997 - 4

I. 中… II. 董… III. 政府投资—影响—宏观经济—经济波动—研究—中国 IV. F12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0673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市场开发部（010）63272190，66070804（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63365686（传真）

读者服务部（010）66070833，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平阳装订厂

尺寸 148 毫米×210 毫米

印张 6.375

字数 192 千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90

定价 25.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4997 - 4/F. 4557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63263947

序

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历来都是经济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们思想上束缚的放开，经济学界也逐步承认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同样存在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事实。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长期被压抑的总需求得到充分释放，无论是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还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一时间犹如决堤之水汹涌澎湃。很多经济学家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存在总需求过旺的情况，不可能出现总需求不足的情况。然而，从1997年开始的长达几年的宏观经济过冷阶段，让很多经济学家陷入沉思，必须对其重新审视。

深入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历次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成因是一件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尤其在当下，在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内需启而不动的环境下，我国相关部门的宏观调控水平再次受到挑战。

我的博士生董进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就对此项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在各种经济学期刊上，每年都会有很多篇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章。作者在参阅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不断思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并将其陆续发表在多种学术期刊上。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之上，作者经过加工修改，最终完成了本书。

之所以为之作序，并将其推荐给众多读者，是因为我认为这项研究具备以下几点有价值的地方：

首先，这项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经济波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它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经济波动，根据大量的资料和文献真实地还原了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中出现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政府调控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最终的调控效果等方面。这对研究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以及宏观经济波动时期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起到了基础的借鉴意义。

其次，这项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周期进行了相对科学的划分。它利用国际公认的比较成熟的几种度量方法对我国1952—2007年的数据进行检验，通过对不同的方法所作出的结果进行相互验证，估算出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间。

最后，这项研究通过计量方法和数理模型论证了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形成的机制。

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辛的工作，需要密切跟踪宏观经济走势，根据宏观经济的变化不断积累和思考，从而作出正确而及时的判断。毕竟，只有尽可能平抑宏观经济的波动，才更加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而作者只是在这个领域迈开了第一步。

在此，非常高兴地将这本书推荐给广大读者，同时也希望作者能够继续深入进去，在这个领域中踏实地做好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魏杰

2009年3月

目 录

1 引言	1
1.1 写作背景	1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3
1.3 研究方法	4
1.4 框架结构	5
2 文献综述	7
2.1 引言	7
2.2 关于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如何划分的研究	8
2.3 不承认我国存在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研究	10
2.4 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阶段	11
2.5 宏观建模及定量分析崭露头角的研究阶段	17
2.6 国际期刊上的一些相关研究	19
2.7 小结	21
3 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测度	24
3.1 引言	24
3.2 衡量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和方法	25
3.3 度量实际 GDP 波动程度的方法	26
3.4 上述方法测度经济波动周期起止时期的结果的比较分析	33
3.5 小结	36
4 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成因分析 I	37
4.1 引言	37

4.2	本书的观点	39
4.3	模型变量以及数据的选取	41
4.4	第一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成因分析	45
4.5	第二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成因分析	55
4.6	第三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成因分析	66
5	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成因分析 II	76
5.1	引言	76
5.2	第四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成因分析	76
5.3	第五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成因分析	91
5.4	五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比较分析	99
6	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成因的量化检验	104
6.1	引言	104
6.2	变量的选取和数据的取值	106
6.3	回归模型的检验	112
6.4	固定时间样本长度的滚动时窗法检验	120
6.5	Panel Data 的检验	133
6.6	小结	139
7	基于一个模型的扩展	143
7.1	引言	143
7.2	一个值得思考的基础模型	145
7.3	加入我国情况后的模型修正	152
7.4	我国宏观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	156
7.5	小结	159
8	结论和政策建议	161
8.1	主要结论	161

8.2 相关的建议	164
8.3 拉动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	168
8.4 本书的主要贡献	171
附录 直接回归法中的各个变量的趋势和波动成分示意图	173
参考文献	178
致 谢	193

1

引言

1.1 写作背景

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改革开放以后，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很多经济现象无法简单地通过套用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因此，对于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就会出现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就 2003 年之后出现的宏观经济过热而言，当时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在很多方面都持有不同的见解，讨论非常激烈。

首先，单是对于到底是否存在经济过热就很有争论。直到 2006 年，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受过西方规范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们，还认为并没有出现宏观层面的经济过热。他们认为中国的数据表现非常好，通货膨胀率不高，经济增长率令人满意，根本就不应该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实施调控只会阻碍经济的正常运行，妨碍就业率的提高。但是，另一派颇具经济敏感度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从 2003 年起宏观经济就已发出了很强的过热信号。固定资产投资率的持续高位，拉动了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过度需求，煤电油气运出现全面紧张，投资品价格不断攀升，从而可能会引发总物价的上涨。更需注意的是，由于我

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基础部门的瓶颈再一次制约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其次，对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议论颇多。在这个问题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次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的手段意味着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在走回头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使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调控，而在这些经济学家们的眼中，法律手段根本就不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所应当或是可以使用的；而且，中国既然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应该再以行政性调控手段为主，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对市场机制的运行破坏极大。大多数经济学家则认为，我国的特殊国情和这轮经济过热的特殊成因，逼迫我国政府必须以行政手段为主、市场手段为辅进行调控。最后的事实也证明，只有以行政手段为主才能尽快地取得预期的调控效果。

其实，种种不同观点的争论背后，有一个问题却被忽视了，那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从 2003 年开始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他们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资源是稀缺的。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最大化其效用，这是经济学的根本问题。然而从 2003 年开始，投资增速迅猛和经济高速增长加快了我国对于各种资源的需求，国内资源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海外能源市场的倚赖越来越大，导致一些别有用心西方国家鼓吹“中国能源威胁论”，一时之间我国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众矢之的。同时，国际能源资源类巨头趁机大肆提价，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CRB）在几年间疯狂飙升，从 2003 年最低时的 228.1 上升到 2008 年最高时的 614.6，上涨幅度高达 169.44%。然而国内投资热情与日俱增，对原材料的需求持续高温不退，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形成了对于物价总水平的冲击，从而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威胁，2008 年单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最高达 8.7%，单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更是创 1996 年以后的新高，最高达 10.1%。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确实出现了投资的过度膨胀，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也是必然之举。

既然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那其根源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得以系统分析，那么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种种争论也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到满意的答复了。

笔者认为，导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地方政府部门主导的投资膨胀，而非市场性因素引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加，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提升城市档次、扩张城市规模而大肆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由此引发了直接投资需求，并拉动了其他与之相关联的投资需求。同时，在实现了自己的投资冲动之外，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压力下，在土地、信贷、税费、排污等方面给予企业过多不合理的优惠，尤其是很多地方政府把房地产业当做地方的支柱产业并给予极大的支持，拉长了产业链，加大了投资规模。

由地方政府参与而导致的这些投资对于市场性调控手段不太具有敏感性，最终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只有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性调控手段才能抑制这种宏观经济过热。

由这次宏观经济过热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联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的另外四次宏观经济过热。可以说，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时，政府部门在其中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面对日益成熟的市场机制，如果地方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具体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持续维持“建设型财政”的功能的话，中国式的宏观经济过热仍将不可避免。

笔者希望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进行详细的分析，仔细分析问题的根源，找到其背后的成因，然后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使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尽量避开不必要的干扰，平稳运行，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动因。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中国式的经济过热历来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毕竟从理论和各国已有的实际经验来看，大幅的经济波动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没有益处的。超出经济体承受范围的经济发展只能维持在一定时期内，而且经济过热带来的物价猛涨会给普通居民的心理带来巨大

的压力,危及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随后而来的经济萎缩、就业压力增大等现象也会造成经济的巨大动荡,有损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建议利用通货膨胀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且不说西方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严重阻碍了本国的经济增长,单就这些经济学家拿来作为例证的亚洲国家而言,也只有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在平均超过10%的年通货膨胀率下,能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全球范围内的实证来看,绝对数量的实例说明高通货膨胀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托马斯·迈耶,1994)。左大培(1992)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以后,发现物价总水平的提高不仅不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会在长期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即靠通货膨胀提高经济增长率的主张是十分荒谬的。因此,虽然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但还是要严防高通货膨胀的情况出现,尽量实现宏观经济波动的最小化。

如果我们能够以确切的历史事实为根据,追本溯源地将导致历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深层次原因、中央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以及效果描述清楚,从而明确宏观经济波动的形成机制,那么这不仅能够为长久以来学术界持续的争论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依据,而且也会为消除今后经济发展的障碍提供参考,从而推动各种相关配套改革措施不断完善、不断改进,尽量避免再出现由不合理因素所导致的宏观经济过热,使政府部门真正成为“裁判”,而非“运动员”或是“教练”。

1.3 研究方法

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分别进行详细的分析,对每一次宏观经济波动中出现的问题、导致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成因的定量检验、政府部门采取的相关经济调控措施以及最终调控效

果等方面作出分析,以此详细地梳理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形成机制,分析政府因素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笔者采取直接回归法、固定时间样本长度的滚动时窗法和 Panel Data 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统一的回归检验。在前两种方法中,笔者以 1978 年至今的全国数据为研究对象,而在 Panel Data 方法中,笔者采取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分地区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此对导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成因进行定量分析。

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之上,笔者试图构建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以此描述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形成机制,分析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得出本书的结论。

1.4 框架结构

为了科学地研究历次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成因,以及各个因素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的大小,笔者对本书的框架结构大致作如下安排:

第 1 章是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研究意义,提出笔者研究该问题的理由。

第 2 章是笔者所作的文献综述,在对现有的文献研究作出归纳总结之后,笔者提出,目前的研究仍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可以将其作为继续研究的着手点。

在第 3 章,笔者运用目前国外公认的比较成熟的几种度量方法,即线性趋势法、H-P 滤波法, Band-Pass 滤波法以及生产函数法,对我国 1952—2007 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按照实际 GDP 波谷—复苏—高峰—波谷的划分标准,对不同的方法所得出的结果进行相互验证,估算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的历次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间,从而为第 4 章和第 5 章分析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打下了基础。

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笔者对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分别进行了讨论,探讨了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背后的成因。在对每一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分析中,笔者都根据各个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 28 年的数据，运用 Panel Data 方法分别对历次宏观经济波动进行了回归检验，并将其作为笔者的量化检验的证据。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分析了历次宏观经济波动中政府的调控手段以及最终的调控效果。

笔者在第 6 章使用了直接回归法、固定时间样本长度的滚动时窗法和 Panel Data 方法，对历年来的所有数据进行统一的回归检验，并通过这三种方法的相互验证，探讨了各个因素对于实际 GDP 波动的影响程度。

在第 7 章中，笔者设立了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以此来描述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形成机制，并再次提出自己的观点。

第 8 章是笔者的结论以及相关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引言

近年来，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选取的时机是否恰当，二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选取的手段是否恰当。其实，要讨论这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前提问题，即导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对这个问题形成充分的认识，我们才能科学地判断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究竟是否正确，以及政府究竟应该主要依靠什么宏观调控手段，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还是行政手段。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研究一直都非常关注，其间也涌现了大量发人深思和值得借鉴的文献。笔者在这一章中会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整理分类，综合各个经济学者的观点，对现有的研究进行定位，并试图从中找到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着手点。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一开始不承认我国存在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阶段，到从事大量的定性分析研究的阶段，再到开始量化研究以及构建宏观模型

进行规范性研究的阶段。

本章将分别对这三个阶段进行展开分析,但是首先,笔者会对另外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进行综述,即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间如何进行划分。毕竟,要分析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背后的成因,划分起止时间是基础。

2.2 关于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如何划分的研究

2.2.1 现有的观点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的经济波动周期的划分,目前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意见:

刘树成、张晓晶、张平(2005)根据1953年到2004年的GDP增长率来划分经济周期,他们以经济增长率的谷位—峰位—谷位为一个经济波动周期来划分,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共经历了五次经济波动周期,分别是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和2002—2005年。

吴俊培、毛飞(2005)认为,根据经济的波峰—波峰或是波谷—波谷的方法来划分经济周期都是不对的。他们借鉴了马歇尔的“正常”和“连续”这两个新古典分析方法的前提,提出了经济的正常状态,划分经济周期的标准就变成了正常状态—正常状态。因此,他们认为,由于制度变迁的不连续性,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一共经历过两个经济波动周期,分别是1979—1993年和1994—2005年。

卢建(1987)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到1985年只出现过一个经济波动周期,而不存在两个经济波动周期。这种意见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认同。

魏杰(2001)认为,在2001年之前中国经历了三次宏观经济过热和一次宏观经济过冷,三次宏观经济过热分别是在1984—1986年、

1987—1990 年和 1993—1995 年,一次宏观经济过冷是在 1997—2001 年。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即考虑经济波动时,需要区别对待过冷和过热,以便更好地研究其导致因素。

杜辉(2005)认为,从 1978 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每次平均为 5~6 年,而第一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波谷出现在 1981 年,第二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波谷出现在 1986 年,第三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波谷出现在 1990 年,第四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波谷出现在 1999 年。经过调整,从 2002 年起我国进入了第五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而且他揣测这轮经济波动周期的波谷会出现在 2010 年左右。

施发启(2000)首先将 GDP 增长率经过三年移动平均,消除短期随机波动后得到检验数据,再通过自相关系数检验,从而得出结论:我国的宏观经济周期长度一般为 4~5 年,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分别是 1977—1981 年、1982—1986 年、1987—1990 年和 1991—1999 年。

这些观点各自的依据不同,划分结果也各自不一。在经济研究中,如何划分经济波动周期一直是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Taylor 和 Woodford(1999)就曾经提出,如何界定经济波动周期、选择何种标准比较科学,一直是经济波动周期研究领域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2.2.2 国外研究方法的借鉴

Taylor 和 Woodford(1999)提出,衡量经济波动的方法是看相关的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和它们长期趋势之间的偏离程度。这些经济指标包括总产出、收入、就业、贸易等,但是最为基本的,也是经济学者们最为关注的,就是 GDP,对于其他经济指标的研究要建立在 GDP 指标的分析研究之上。判断经济波动是否出现,就是看实际 GDP 偏离潜在 GDP 的程度。

衡量潜在 GDP 的方法有很多。胡乃武、刘睿(2005)曾经就此问题做过文献综述,里面有详细的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大体分为单变量工具法(univariate methods)、生产函数法(production functions methods)、增长核算法(growth accounting methods)和分部门核算加总法(analysis by sectors)等,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是前两种。单变量工具